


# 民族语文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语言室编



## 编 辑 说 明

《民族语文研究情报资料集》是关于民族语文研究方面的综合性的不定期的内部参考读物。

《民族语文研究情报资料集》刊载国外有关民族语文研究的理论、方法和学派的综述，重要论文的翻译、摘译和译述，有关专著和期刊的介绍；并兼及与中国民族语言学会等学术团体有关的重要活动的介绍。可供我国从事少数民族语文研究和教学人员、学习少数民族语文专业的大专院校的学生以及对语言学有兴趣的读者参考。

本文集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语言研究室《民族语文研究情报资料集》编委会组稿。欢迎投稿。

来稿请用行间有空的带格稿纸单面横写。译文要求附原文（原文用后退回）。字迹要求清晰，译文中出现的外文一律用印刷体；人名、书名等请先写中文，然后在括号附上外文。来稿请挂号寄送北京西郊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语言室《民族语文研究情报资料集》编辑组。稿件刊用后将酌致薄酬；译稿如不刊用，均负责退还。

限于资料、人力、业务水平以及印刷等方面的条件，我们的编辑工作一定会有许多缺点错误，欢迎同志们批评帮助。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语言研究室

一九九〇年

# 目 录

## 译 文

- 论蒙古语言的分类问题……………【加】R. I. 宾尼克 著(1)  
乐赛月 译
- 论见之于叶尼塞铭文中的“Säkiz adaǰliiy barim”  
……………【日】护雅夫 著(14)  
丁文楼 译
- 日本的朝鲜语研究史概观……………【日】河野六郎 著(39)  
张 瑞 译  
王翰世 校
- 从印欧语言学家的观点看阿尔泰学……………【苏】П. Г. 赫尔岑贝格 著(46)  
王远新 译
- 维吾尔语中的同音词问题是词汇借用的结果……………【苏】O. A. 米津 著(57)  
许浩福 译
- 声调来自台语；东南亚语言声调系统  
的分布特征……………【美】J. 普拉克齐克 著(63)  
黎 意、崔建新 译  
邢公畹 校
- 布泰语言(下)……………【泰】威莱弯·哈尼沙塔纳 著(83)  
杨光远 译
- 中国境内藏缅语指示方向的动词附加成分……………【日】西义郎 著(104)  
郑贻青 译  
陈 鹏 校
- 苗语的分类问题……………【苏】P. Ф. 伊茨 著(117)  
张开远 译

- 喉音特点和声调发展……………【美】李方桂 著 (130)  
邢 凯 译  
邢公畹 校

### 语言接触与语言变化

- 一论克里奥耳式语言的产生……………【美】P. 特鲁杰尔 著 (138)  
黄 行 译
- 汉字词的传入与系谱……………【南朝鲜】沈在箕 著 (141)  
周四川 译
- 拉伩语的实地调查……………【日】三谷恭之 著 (148)  
吴思齐 译  
刘凤翥 校

### 书 评

- 评 R. J. 比克等编辑《纪念 W. J. 格德尼  
泰学研究会论文集》……………【美】D. A. 史密斯 著 (153)  
乐赛月 译
- 评 D. I. 斯洛宾和 K. 齐默编辑的  
《土耳其语言学研究》(一)……………【美】艾瑞卡·H. 格尔松 著 (154)  
郭 立 译
- 评 D. I. 斯诺宾和 K. 齐默编辑的  
《土耳其语言学研究》(二)……………【土】艾娃·阿格涅斯·贾多 著 (156)  
郭 立 译

### 人 物 介 绍

- 著名语言学家莱曼教授简介……………众 志 编译 (160)
- 护雅夫先生小传(1921—)……………丁文楼 (168)

### 资 料

- 米沙尔鞑鞑语词汇表……………Zsuzsa Kakuk 著 (169)  
王 真 译

## 下 期 目 录

### 译 文

- 藏语口语表明“存在”的动词中确定性的层次体系  
..... 【美】谢榕蒂、张琨 著  
赵衍荪 译
- 早期苗瑶语同藏缅语的借词关系..... 【美】白保罗 著  
乐赛月 译
- 白保罗的澳泰语假设和汉泰语关系的传统观点..... 【美】易嘉乐 著  
欧阳觉亚 译
- 原始藏缅语动词的人称范畴..... 【美】S. 狄兰西 著  
拉玛僵 译
- Z音化与S音化—阿尔泰理论的主要基础..... 【土】塔拉提·铁肯 著  
宋正纯 译
- 原始阿尔泰语的X'..... 【美】罗伊·安德鲁·米勒 著  
阎 燕 译
- 论古代突厥如尼文的起源..... 【苏】B. A. 里乌什茨 著  
张铁山 译
- 哈萨克语某些词的词源考释..... 【苏】阿布勒别克·努尔马罕别托 著  
巴扎尔汉 译
- 论17世纪的一些达斡尔语地名..... 【美】K. H. 门格斯 著  
王秀珍 译
- 论维吾尔语、哈萨克语和其他突厥语言  
中动词形成的发展问题..... 【苏】A. K. 卡雷巴耶娃 著  
许浩福 译

- 突厥语数词“一”的来源……………【苏】Э. К. 艾尔尼茨 著  
米海力 译
- 现代朝鲜语的音位及其变体……………【日】梅田博之 著  
金红莲 译
- 北孟高棉语声调产生的机制……………【美】简·澳洛夫·斯万特森 著  
孔江平 译
- 关于语言的法律制度……………【苏】H. B. 谢柳托 著  
许浩福 译

### 书 评

- 评 J. 麦科伊和 T. 莱特编辑《汉藏语言研究的贡献》  
……………【美】W. G. 博尔茨 著  
乐赛月 译
- 评 P. B. 果尔顿著《哈扎尔语研究》……………【美】K. H. 门格斯 著  
王秀珍 译

### 人 物 介 绍

- 杰出的满一通古斯学家瓦连京·阿列克桑德拉维奇·  
阿夫洛林……………胡增益 编译

### 会 议

- 第五次全国民族语文科学讨论会……………本刊编辑部

### 资 料

- 《藏缅语区语言学杂志》(LTBA)简介……………众志 编译

# 论蒙古语言的分类问题

R. I. 宾尼克 著

乐赛月 译

1. 关于蒙古语族的语言数目一直既没有一致的意见，也没有有关它们的共同来源统一  
的看法。

蒙古语族语言诸方言，除了一些确定例外外，从西部的阿尔泰山脉到东部的大兴安岭，  
从北部的贝克尔湖到南部的长城，在这一椭圆形地域内形成了紧密的统一体。<sup>①</sup>在政治上，  
这一地域包括布里亚特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部分），蒙古人民共和国和内蒙古，及  
邻近的中国省份操蒙古语族语言的边缘地区。

这些操蒙古语族语言的大多数人都共有蒙古民族的文化传统。中国东北的达斡尔  
（Dagur）和西南（甘肃省）被归于操“孤立语”的一些民族除外。从地理上看，与其他语  
言分离的是阿富汗的莫戈勒语（Moghol）和里海伏尔加河西北部的卡尔梅克语（Kalmuck）  
（在卡尔梅克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内）。

所有的资料都一致地将孤立的达斡尔语、莫戈勒语和土族语（Monguor）列为独立的语  
言，而且还一致地把中部地区区分为北部蒙古语（布里亚特语（Buriat）、东部或中部蒙  
古语（“正宗的蒙古语”包括喀尔喀语（Khalkha）和西部蒙古语（卫拉特语（Oirat））  
（参见桑席耶夫（Sanzeev）1952：40）。

波普（Poppe，1955：23）给这个语族划分列表时增加了卡尔梅克语（波普在1965：10  
中把卡尔梅克语处理为卫拉特语的一部分），正如多尔弗（Doerfer）（1964：41—43）、别  
尔达嘎耶夫（Bertagaev）（1968：9）和桑席耶夫（1977：495）所列的语族表那样。西诺  
尔（Siner，1952：371）把西部蒙古语（卫拉特语）区分为三个语支：卡尔梅克语、科布多  
卫拉特语（Kobdo Oirat）和包括科科努尔托尔扈特语（Kokonur Torgut）、伊犁河谷奥洛  
语（Olô）的一个语群。

多尔弗把波普（1955著作）的（东部）蒙古语分为中部蒙古语（主要是喀尔喀语）和南部  
蒙古语（内蒙古诸方言，包括鄂尔多斯（Ordos）和察哈尔（Chakhar））；而西诺尔（1952  
：373）则试探性地提到了“南部蒙古语”。

西诺尔满意地列举了一群“古语言”，包括（除达斡尔语和莫戈勒语外）上族语、锡拉  
裕固语（Shera Yögur）、三川语（San-Chuan）、东乡语（Santa）和阿拉吉瓦语（Aragwa）。  
波普（1955年著作）和多尔弗认为这些“语言”（加上锡隆戈语（Shirongol））是土族  
语的方言，后来波普（1965：9）又增添了保安语（Baoan）。可是，波普在（1965：7-8）  
著作里把东乡语处理为源于土族语的一个独立语言。桑席耶夫和别尔达嘎耶夫把东乡语和保  
安语处理为同土族语有区别的两种语言。

波普的描述大部分已为人们所接受，至少在西方是这样，并在一般参考书籍里作为有权

威性的见解。然而，一个相当不同的见解在苏联学者中间已获得认可。根据别尔达嘎耶夫（1968：9）和桑席耶夫（1977：495）提供的分类表，有三个主要语支，即北部语支或元音和谐律语言，包括蒙古语、布里亚特语、卡尔梅克语和卫拉特语；南部语支或无元音和谐律语言，包括达斡尔语、土族语、东乡语和保安语；“媒介语”，即蒙古文学语言和莫戈勒语。<sup>①</sup>

这两种见解不仅在它们的语言分类上不同，而且在语言分类标准方面也不一样，它们反映了理论和方法的不同。<sup>②</sup>这两种分类法都试图证实蒙古语支之间所具有的谱系关系或发生学关系，但是，它们又都存在很多问题，至少从外表上看这两种分类法在总体上存在着广泛和深刻的分歧。

遗憾的是，对建立语言间所具有的亲缘关系的标准的讨论没有继续下去。波普和多尔弗的观点，无论表面上看多么有道理，但是至今仍没有通过评价性的争论得到充分的支持。到现在一直没有关于标准特征选择的系统性论据。

基本上在确定诸方言之间的亲缘关系方面，历史学和人类学例证将起着重要作用。但是，除了大量重要的有关的语言学例证外（为我们的历史人种史填补了空白），纯语言学标准在确定方言或语言群之间的界线必定起着主要作用。<sup>③</sup>

本文的目的是要论述这些语言学问题。通过对上述语言的语音学和形态学的再次检验，揭示出西方和苏联的分类表都有不足之处，尽管苏联的分类表似乎更正确些。最深奥的二分法不是在西部语言（卫拉特语、莫戈勒语）和东部语言（蒙古语、布里亚特语等）之间，而是在有完全能产的元音和谐律语言和无元音和谐律语言之间（尽管这种差异本身并不是唯一的标准）。对这一点来说，东—西的划分是后来发展的。

我们可以说，中部语群，包括上面提到的在紧密相连地区中所操的诸方言（加上卡尔梅克语），同边缘语群，包括没有超出主要蒙古文化范畴的语言（莫戈勒语），或者超出主要蒙古文化范畴的语言（达斡尔语、土族语等）相对立；东—西的划分只运用于中部语群。我们还会看到，在保留古老特征方面卫拉特语（包括卡尔梅克语）同布里亚特语、喀尔喀语共有许多变异时，在保留古老特征方面卫拉特语和莫戈勒语之间有着明显的不同，而且，如果这两个语言之间有任何互变类似的话，那也是极少的。

然而，至今要提出一个确切的描述是不太可能的，但是，我们将进一步认识到，有理由怀疑任何简单的谱系模式都能充分地揭示出蒙古语史的真实情况，并且希望在未来研究中要获得令人满意地描述，将必须放弃这种过于简化的方法。

2. 蒙古语言分类的主要问题之一是难以确定这些语言究竟是什么语言。对于能认识到所有的“语言”不是都能加以比较的这一点很重要。使用西里尔（Cyrillic）\* 字母的喀尔喀书面语同喀尔喀口语并不相同；书面语是在一定时期内从某个方言任意筛选的特征中提取的人为结构，随后长时间内在传统形式中保持相对不变状态。所以拿书面语和口语进行比较，或者在书面语和口语之间使用相同标准都是非常错误的。

例如，拿蒙古文学语言的前化的后圆唇元音同那些方言口语的前化圆唇元音进行比较是毫无意义的。但是，我们不仅仅能推断出我们惯用 ö 和 ü 标记的元音的实际发音，而且还能说明方言口语例证在某个时期不同方言的同一个词里可能有不同的高元音（ö~ü）。另外，关于现代书面语，它们是广泛的方言差异范畴间的折衷语言。

\* Cyrillic 西里尔字母是早期的斯拉夫字母。这里实际指的就是现今的斯拉夫字母。



甚至在对口语表示怀疑的地方，“语言”这一术语的含意立即变成模棱两可和含糊不清。有民族语、国语以及在某些地区或某些族群所操持的在语言学上类似方言的一组简单语言。这三种语言无需一致。在各地（如广东）所操持的彼此难以理解的一群汉语方言，有时被称作语言（如粤语）。但是，从整体来看，一致认为汉语是一个语言，因为它有一个共同书写形式，汉语是汉人的民族语，因为汉语还是中国的国语。

另外，斯堪的纳维亚所操的口语（不包括冰岛语）形成了语言统一体。然而，我们说的丹麦语、瑞典语和挪威语，每一种语言都具有用作国语的书写形式——实际上，挪威语跟现代希腊语一样，有两种不同的书写标准。同样，印地方言和乌尔都方言形成一个语言统一体，而它们形成三种不同书面语（包括印度斯坦语（Hindustani））的基础，其中两种用作民族语和国语，并且在印度斯坦方言里有符合梵语化和阿拉伯语化的趋向。如果我们在考虑语言问题时排除书面语形式，那么就具有了如何对语言一词下定义以及如何确定语言的问题。使用“纯语言学”标准有许多困难，诸如由等语线束形成的界线。首先，正如西诺尔（1952：371）和多尔弗（1964：39）观察到的，各种蒙古诸方言之间的差异完全是微不足道的，如果有暂时的特征差异的任何例证的话，那也是极少量的。如果任何蒙古语都是“古老的语言”，那末很清楚决不能同德语支相对的梵语或拉丁语有关的古语相比较。其次，在任何两群方言之间能够被绘出的等语线数是任意的，它们所反映的特殊细节既可能被忽视也可能被重视。但是，我们没有全面掌握语言的历史，非常缺乏早期蒙古语的历史，因而不可能有区分重要的等语线同细小的、不重要的细节的明确方法。

相互理解，被提出来作为具有共同语言的一个标准，但事实上，许多细微的语音差别能使方言之间互相不能理解。另一方面，如果它们的差异完全是多余的的话，那末有关语言诸方言之间就能彼此达到高度的理解。<sup>①</sup>但是，也不十分清楚相互理解的含意是什么。是在所有情况下立即理解？在大多数情况下理解？还是有时在作了校正后理解？

对无关的“语言”进行探索注定是失败的。最多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关于筛选出来的任何某个特征或某些特征有相当多方言同这些特征相一致，而也常常同另一组特征相一致。从这一观点来看，西部布里亚特语是一个“语言”，布里亚特语也是个“语言”，蒙古语甚至可能阿尔泰语系的所有语言在总体上看也一样。从历时的观点看，随意使用这一术语并没有什么特别不恰当的后果。确定语言单位的层次和决定每个层次的次单位成分完全是我们的任务，不管我们把这些次单位成分叫做什么。既无必要也无可能去列举无联系的和独立的一组蒙古语言。

3. 尽管多尔弗（1964著作）提出的分类表基本上是波普（1955著作）的分类表，只是稍微作了些改动。但是，他对有关主要东—西二分法的例证表示怀疑。至少如果确实存在东—西之分的话（也许反映在中期蒙古语h-方言里，它同以蒙古文字学语言为基础的o- 调首方言相对立），那末就有充足理由怀疑这种东—西之分同经过乌拉特语、卡尔梅克语与布里亚特语、喀尔喀语比较揭示出来的二分法没有任何联系。为了对西部蒙古语（包括卡尔梅克语的乌拉特语）同东部蒙古语（布里亚特语、喀尔喀语、鄂尔多斯语等）进行有效的比较，我们首先需要对东部蒙古语本身进行分析。这个语群的诸方言在句法、形态学和语音学方面的差异确实非常小。各种布里亚特语、喀尔喀语以及内蒙古诸方言共有许多重要的特征。它们发展成为唯一的具有完整声位和谐系统的方言（#1）；只是在布里亚特语和喀尔喀语方言里原先<sup>24</sup>确实为擦声（#2）；仅仅这个语群具有所谓的“方向格”（#3）。

<sup>①</sup> 声位和谐（85, 89ff）。只是在布里亚特语，喀尔喀语和有关的内蒙古诸方言里

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圆唇化或唇位和谐系统，在唇位和谐里出现在词干中的圆唇化元音迫使后边词缀中的元音圆唇化。所以，在词干中  $o(\ddot{o})$  元音后，布里亚特语、喀尔喀语、鄂尔多斯语的造格 (202) - $\ddot{o}r(-\ddot{a}r)$ ；但是卡尔梅克语是 - $\ddot{a}r(-\ddot{a}r)$ ，莫戈勒语是 - $\ddot{a}r(-\ddot{a}r)$ 。达斡尔语的造格 - $\ddot{a}s(-\ddot{e}s)$  与其相对应。由于非高元音的圆唇化作用，在莫戈勒语、土族语和达斡尔语词干里发现一种发展不完善的唇位和谐 (54f.)。所以，蒙古学语言 *nüke* “洞”，土族语是 *nok'no*，“凿洞”是 *nok'uola*-或 *nok'uolo*- (斯米特 (Smedt) 和莫斯塔尔特 (Mostaert), 1964: 188)。中期蒙古语 (*Muqaddimat al-Adab*) *bora* “灰白”，莫戈勒语 *borö*，阿拉尔布里亚特语、卡尔梅克语、土族语、鄂尔多斯语 *boro*；喀尔喀语 *born* (达斡尔语在类似形式中有 *a*)。但是其中没有一个语言在词缀中是一种能产的唇位和谐系统。

(2)  $k > x$  (139ff)。\* $k$  在达斡尔语、卡尔梅克语、土族语、莫戈勒语、鄂尔多斯语以及一些布里亚特方言里仍保持塞音性质。只是在喀尔喀语和大部分布里亚特方言里 \* $k$  变成塞擦音或更普遍地变成擦音 ( $x$ )：蒙古学语言 *ködel-* “移动”，中期蒙古语 (《蒙古秘史》) *gödöl-*，卡尔梅克语 *ködl-*，土族语 *gudöli-*，鄂尔多斯语 *ködöl-*，但是阿拉尔布里亚特语是 *xüdüi-*，喀尔喀语是 *xöddöl-*。参见 (拉萨丁 (Rassadin) 1982: 21) 蒙古学语言 *köke* “蓝色”；东部布里亚特书面语 *xüxe*；西部布里亚特语 *xöxö*，喀尔喀书面语 *xöx*；卡尔梅克书面语 *kök*。

(3) 方向格 -*ru* (205)。所谓的方向格，实际上是一种后置词，它是在蒙古学语言中出现的；*inaru* “这边，在…之前”。基本上它被限于布里亚特语、喀尔喀语和这类有关方言如鄂尔多斯；在这些语言里它出现为 -*ru(-la)*：如布里亚特语 *uharu* “接近水”。在达斡尔语、卡尔梅克语 (卫拉特语)、土族语或莫戈勒语里没有发现这个格。

这个语群诸方言之间的语音差异并不十分重要。在一些布里亚特方言里  $\ddot{o}$  和  $\ddot{u}$  已合并了。但是，在其他方言里却保持着对立，正如这个语群的其他语言所反映的那样 (#4)。有一些布里亚特方言使古老的 \* $ai$  单元音化，但是其他方言同喀尔喀语和鄂尔多斯语一样并非如此 (#5)。布里亚特语使辅音腭化，而且在不同上下文中比喀尔喀语或鄂尔多斯语更容易 (#6)。布里亚特语中  $s$  的变化是较近期的事，而且是这个语言所独有的现象 (#7)。

(4)  $\ddot{o} = \ddot{u}$  (48ff)。原先的  $\ddot{o}$  和  $\ddot{u}$  在达斡尔语、莫戈勒语以及东部布里亚特语、卡尔梅克语 (卫拉特)、喀尔喀语、土族语、鄂尔多斯语里已部分地或全部合并在一起了，而西部布里亚特语则保持着区分：中期蒙古语 *öles-* “挨饿”；蒙古学语言、鄂尔多斯语 *ölös-*；卫拉特语 *öls-*，阿拉尔布里亚特语 *üldü-*，但是，达斡尔语 *unsu-*，莫戈勒语 *uulasu-*，科尔布里亚特语是 *unde*；中期蒙古语 *ükü-* “死”，卫拉特语 *ük-*，布里亚特语 *uxe-*，达斡尔语 *uqur-*，莫戈勒语 *ukur-*。还可参见上面 (#2)。

(5) 单元音化 (76ff)。B 或 Bji 形的复元音 (其中 B 是一个后元音) 在卡尔梅克语、鄂尔多斯语 ( $ai > \bar{a}$ ，土尔扈特卡尔梅克语  $\bar{a}$ )、土族语 ( $ai > e$ ) 里一般已单元音化；在喀尔喀语 ( $ai > \bar{e}$ )、莫戈勒语 ( $ai > e_i$ ) 里从不单元音化；而在其他语言里有单元音或复元音各种变化；蒙古学语言、达斡尔语 *dalai* “海”；德尔伯特卡尔梅克语、鄂尔多斯语、阿拉尔布里亚特语 *dalā*；土族语 *dale*；喀尔喀语 *dal'ä* (参见莫戈勒语 *yoqei* “猪”，蒙古学语言 *yaqai*)。

(6) 辅音腭化。在达斡尔语和许多布里亚特方言里，某些辅音在  $i$  之前被腭化。这类腭化现象并不是其他蒙古语言的特征；蒙古学语言 (后置的) *minu* “我的”；布里亚特语、达斡尔语 -*mn'i+*；鄂尔多斯语 -*min*；等等 (222)。蒙古学语言、莫戈勒语 *bari* “抓

住”；布里亚特语、达斡尔语 *bar'i-*；卡尔梅克语 *bar-*；喀尔喀语 *bar'-*；鄂尔多斯语 *bar-*。（可是，在朝鲁（Tsoioo）1976年的著作里各处都有喀尔喀语在一定条件下的腭化现象）参见（#16）。关于布里亚特语参见 Abaseev（1965：11f.）和拉萨丁（1982：29）的文章。

（7）*s > h*, *t*（119ff.）。有些布里亚特方言词首*s*变为*h*；最后*s > t ~ d*。这个具有特色的布里亚特语的变化不出现在其他蒙古语里：蒙古文学语言 *saya* “月亮”；卡尔梅克语 *say*；莫戈布布里亚特语 *sard*；阿拉尔布里亚特语 *hara*。蒙古文学语言、喀尔喀语 *bös* “棉织品”，土族语 *bos*，阿拉尔布里亚特语 *büd*。参见（#8）和拉萨丁（1982：160f.）。

在形态方面发现更重要的差异。布里亚特文学语言和某些方言保留了“不稳定”-*n*，而喀尔喀语和鄂尔多斯语都已丢失（#8）。这群语言表示第一人称复数代名词不一致（#9）。布里亚特语和鄂尔多斯语保留了联合（共同）格的古老形式的痕迹，而在喀尔喀语里联合格已经丢失（#10）。既不是喀尔喀语也不是鄂尔多斯语，而是布里亚特语发展了人称动词词尾（#11）。布里亚特语和喀尔喀语在带呼格动词形式里（#12a）和在某种程度上带其他形式（#12b—d）的否定形式里有所不同。是布里亚特语和喀尔喀语而不是鄂尔多斯语具有复合形式 *nomen usus*（#13）。

（8）主格形式里的“不稳定”-*n*（185ff.）。在某些名词的主格形式里发现的“不稳定”-*n*，在达斡尔语、喀尔喀语、土族语、鄂尔多斯语以及某些布里亚特语方言里都已丢失；但是在卡尔梅克语、莫戈勒语、西部布里亚特语和布里亚特文学语言中仍保留着：蒙古文学语言、莫戈勒语 *usun* “水”；布里亚特文学语言 *uhan*；卡尔梅克语 *usa*；但是达斡尔语是 *os*（拉萨丁1982：81）；喀尔喀语 *us*（*so*）；*fudzu*；鄂尔多斯语 *usu*。参见拉萨丁（1982：31）。

（9）排除式和包括式“我们和咱们”（215ff.）。蒙古语原先区分排除式“我们”（不包括第三者）和包括式“咱们”（包括第三者）。但在现在语言中只有达斡尔语和莫戈勒语有不同的主格代词：蒙古文学语言 *ba*（排除式），*bida*（包括式）；达斡尔语 *bā*, *b'ada*；莫戈勒语 *bidat*, *-u*（这个后附着语素只出现在动词里）。其他语言只使用 *bida* 的反身形式。蒙古文学语言还区分间接词干如 *man-* 和 *bidan-*；并且有斜格形式的补充表示法，尽管有一些在中期蒙古语里没有。达斡尔语、鄂尔多斯语只在领格里有两个词干（*man-*，达斡尔语 *b'adan'i*，鄂尔多斯语 *bidan'i-*）。卡尔梅克语和喀尔喀语在整个斜格（*oblique cases*）里仍保持两个不同的词干，即 *man-* 对 *bidn-*。布里亚特语只有 *man-*。莫戈勒语的一些方言有变化，正如波普只提供莫戈勒语 *mōn-* 而且仅仅出现在领格、与格和离格中的情况那样；而韦尔斯（Weiers 1972：122）提供了只出现在领格里的 *moni-~manì-*，和出现在其他格里的 *bida-*。普里查克（Pritsak 1964：170）提供了出现于领格、宾格、与格和离格的 *mōn*；只出现于离格的还有 *bidanāsa*。参见李盖提（Ligeti 1955：129）。

（10）联合格形式（203ff.）。蒙古语的联合格有三个原始形式，即 \**-luya*，一种伸延形式 \**-luyaj*，和 \**-taj*。在蒙古诸语中发现的这种形式有蒙古文学语言 *-luya+*；中期蒙古语 *-lu'a*, *-lā+*；布里亚特语 *-lā+*, *-tā+*；土族语 *-la*, *-de*；鄂尔多斯语 *-lā-*, *-tā+*；卡尔梅克语 *-lā+*, *-tā+*；莫戈勒语 *-lei*；达斡尔语 *-t'i*；喀尔喀语 *-t'e*。布里亚特语的 *-lā+* 正逐渐被废弃或已被废弃。

（11）人称动词词尾（251f.）。蒙古语原先在动词上没有人称词尾。仅仅布里亚特语、卡尔梅克语和莫戈勒语从后置的双重（加强语气的？）代词（例如在蒙古文学语言里发现的）发展了这些人称后缀。所发现的这些形式稍有差异；布里亚特语（56）第一人称单数

-b, 第二人称单数-s, 第一人称复数-bdi, 第二人称复数-t(a) (布里亚特语还有一个第三人称形式-d); 卡尔梅克语 [兰司铁 (Ramstedt) 1935: 182]-w(-b), -ts(ʻ), -wdn, -rv ( “v” 代表各种像o-一样的元音); 莫戈勒语 (韦尔斯 1922: 124, 还参见普里查克 1964: 177)-bi, -či, -(b)da, -to(d)。

(12) 否定结构 (290ff.)。蒙古语除了使用其他否定形式外, 更多地使用带“呼格”动词形式的不同否定形式, 诸如命令句。大多数语言在定式动词, 动名词 (VNs) 和副动词的否定结构中有差异, 而且一般还在每个语群里也有差异。

① 连同呼格 在蒙古文学语言 (buu)、中期蒙古语 (bu)、布里亚特语 (bw)、达斡尔语 (bu)、土族语 (bi; 斯米特和莫斯塔尔特 1964: 137f., 托达耶娃 1973: 317)、莫戈勒语 bi (韦尔斯 1972: 143) 里只发现一种连同呼格否定词; 卡尔梅克语只有 bitske。喀尔喀语第一人称 (bu) 与第二、第三人称 (bitogi) 有区别。

② 连同定式动词 蒙古文学语言随意地使用 üü 和 ese, 但是土族语、莫戈勒语把 li, le < üü 专门作为现在时标志; 把 se, sa + < ese 专门作为过去时标志; 卡尔梅克语只有 es。达斡尔语或者用 ul < üü 或者用 es 作为现在时标志, 但是只用 ul 作为过去时标志。布里亚特语、鄂尔多斯语、喀尔喀语仅有其中小部分的残余, 而且一般地使用后置 \*ügei 的反映形式, 在喀尔喀语和鄂尔多斯语里把 \*ügei 的表现形式后置在动名词后代称定式动词。所以喀尔喀文学语言 javna “去” 的否定结构是 javaxgüj。

③ 连同动名词 连同动名词的否定结构是很复杂的, 各种语言都使用上面所引用的三种否定词的表现形式, 尽管与不同的动词形式连在一起。所以在土族语里动作者动名词 (nomen actoris) 采用 uguā 形式, 但是完成体动名词则使用 se 形式。只是布里亚特语、卡尔梅克语、喀尔喀语和鄂尔多斯语专门使用 \*ügei 的表达形式, 而且带所有的动名词。

④ 连同副动词 (Cvs) 连同副动词的情况一般与连同动名词的情况类似, 除专门化功能外大多数语言使用一种混合形式。布里亚特语和喀尔喀语又一次用动名词 + \*ügei 的表达形式代替否定词/副动词的组合形式; 尽管喀尔喀语有带条件的 es 和布里亚特语有带语气 weei 的单一副动词。

(13) 重复动名词或者经常体动名词 (273ff.)。蒙古文学语言 -day + 表达形式只在布里亚特语、卡尔梅克语、喀尔喀语、鄂尔多斯语里被发现。带系词 \*aysan 的复合形式只在布里亚特语和喀尔喀语里被发现, 例如, 布里亚特语 hudaghau “我曾在哪里生活过”。

因此, 所有的学者都一致认为这个语群之间联系密切, 它们共同具有基本上属于这个语群所独有的三个主要特征。但是, 从某种程度上说还具有十个以上或更多的特征差异。这一点清楚地说明了卡尔梅克语 (如典型的卫拉特语) 与这些方言共有为卡尔梅克语、布里亚特语、喀尔喀语以及有关诸方言所独有的十个重要特征这一正确的事实。仅仅在这个较大语群里, 有 \*č 和 \*j 变为擦音 (#14) 或后元音舌位前化 (#15) 的现象。它们是最好地保持蒙古语词首重音的语言 (#16)。只在这些现代语言里发现所谓的“程度格” (#17), 复数标志 -d 的新复合形式 (#18), 或联合格的复合形式 (#19)。这个语群的指代词间接词干是相似的, 而且一般说来它们的形式是这个语群所特有的 (#20)。卫拉特语问鄂尔多斯语在与一位格的处理上稍有类似之处 (#21)。它们还很好地保持着元音间位置的和谐, 而达斡尔语似乎也同样如此 (#28)。

(14) \*č, \*j (110 ff.)。蒙古文学语言腭擦音的表现形式, 仅仅在喀尔喀语和某些布里亚特语方言 (诸如额尔齐斯布里亚特语和萨尔特布里亚特语) 里分别变为 ts 和 dz (在 i 前除

外)；卡尔梅克语的  $\dot{c}$  也变为  $ts$ ，尽管  $j$  变为  $z$ ，没有变为  $dz$ 。(布里亚特语其他方言有这两个塞擦音的各种擦音变化)。

(15) 后元音舌位前化(abff.)。在卡尔梅克语里，在下一个音节  $i$  前的后元音有舌位前化的情况( $a > \bar{a}$ ,  $o > \bar{o}$ ,  $u > \bar{u}$ )。在喀尔喀语、鄂尔多斯语和大部分布里亚特语方言里也有  $a$  和  $o$  被前化(中间化)的各种变化( $\bar{a}$  和  $\bar{o}$ )。而达斡尔语、土族语和莫戈勒语没有这类前移变化。参见：蒙古文学语言、莫戈勒语 *morin* “马”；达斡尔语 *mor'i*；土族语 *mōri*；布里亚特语 *mōr'oŋ*，喀尔喀语 *mōr'*，鄂尔多斯语 *mōri*，德尔伯特卡尔梅克语 *mōrn*。拉萨丁(1982: 9)的材料里有巴尔古津布里亚特语 *mōrin* 和 Nizhneudik 语 *m'ōriŋ*。参见( # 6) 有关 *bari* - “抓住”。

(16) 重音变化。布里亚特语(波普1960: 19)、达斡尔语(波普1930: 126)、卡尔梅克语(兰可铁1935: 13)、喀尔喀语(波普1951: 13)一般地有词首重音。莫戈勒语的重音是变化的(韦尔斯1972: 89ff.)。在土族语和有关的保安语里一般说来重音有变化(托达叶娃1966: 52)。因此，蒙古文学语言 *ōndegen* “蛋”，保安语是 *ndegi*，土族语是 *ndige*。不是所有的西南方言都有重音变化；例如东乡语就没有重音变化；*endegi* “蛋”(托达叶娃1961: 18)。

(17) 程度格(206)。在中期蒙古语里发现了罕见的所谓“程度格”的副词形式(- $\dot{c}a+$ )，这种形式也只是在布里亚特语、卡尔梅克语、喀尔喀语和鄂尔多斯语里有；在蒙古文学语言里还发现延伸形式(- $\dot{c}aya+$ )。蒙古文学语言 *ebūdügöce* “同膝盖相齐，到膝盖”、卡尔梅克语 *ōwdoktsē*、喀尔喀语 *ōwdöktsō*。在达斡尔语、土族语或莫戈勒语里没有发现这种程度格。

(18) 复合复数-d(180ff.)。复数标志-d 可能出现复合形式，诸如蒙古文学语言 *-ud*、*-γud*、*-uuγud*。这种类型的新复合形式 \**-sud*、\**-dud* 和 \**-narud* 只出现在布里亚特语、卡尔梅克语、喀尔喀语和鄂尔多斯语里。

(19) 联合格的复合形式(204、207f.)。①联合格的复合形式出现在前古典蒙古文学语言和中期蒙古语(Mu)里：*-layabar+* > *-lar+*。只有布里亚特语、卡尔梅克语、鄂尔多斯语有这个形式的表现形式。②在蒙古语格范围内还能增加其他格形式。可是，只有在布里亚特语、卡尔梅克语和喀尔喀语里能够在联合格上构成这个类型的双重格(增加任何其他格)。

(20) 指示代词词干(226f.)。蒙古语的指示代词“这”和“那”每一个都有两个不同的间接词干。在现代语言里，蒙古文学语言词干 *egün-* 和 *tegün-* 表现形式只是在布里亚特语、喀尔喀语、鄂尔多斯语和卡尔梅克语里被发现( $\bar{u}n$ ,  $t\bar{u}n-$ )，其他语言(达斡尔语、土族语、莫戈勒语)使用词干 *enen-*、*ten-* 的形式。同样，在布里亚特语、达斡尔语和喀尔喀语里发现这个类型的间接词干 *tere(n)-*；在卡尔梅克语、喀尔喀语、鄂尔多斯语里发现这个类型的间接词干 *terün-*。

(21) 与-位格(195f.)。蒙古文学语言有两个不同的与-位格形式，即 *da+* 和 *-du(r)+*。土族语只有 *-du*。卫拉特语(不是卡尔梅克语)和鄂尔多斯语有 *-du+*，但是在反身领格里有 *-da* 的表现形式，即 *-dān*。所有其他语言只有 *-da* 的形式。

东部语言和西部语言之间的差异究竟是什么？正如上文所述，卫拉特语缺乏唇位和谐( # 1)；它保留 \**k* ( # 2) (和 \**q*， # 22)；而且没有“方向格”( # 3)。卫拉特语可能保持一个有一定序列的复合元音，这个复合元音在其他语言里减缩为单元音( # 28b)。卫拉

特语缺乏保留在喀尔喀语和鄂尔多斯语里的复数 -n (# 23)。i 的“转折”在卡尔梅克语里也没有象在东部语群那样产生相同的结果 (# 24)。总的说来，东—西语言之间的类似比差异更为显著。

(22) \*q 和 \*i (33, 133ff.)。在蒙古文学语言和中期蒙古语里 \*i 变为 i，而莫戈勒语是保持 \*i 和 \*i 对立的唯一的现代语言，然而，只与 q 和 y 搭配；在所有其他语言里只发现 i。q 同样只被保留在莫戈勒语里，而在其他语言如在达斡尔语、卡尔梅克语和鄂尔多斯语里在 i 之前则变成前塞音；有时候在达斡尔语和土族语里变成浊塞音；但是一般变成擦音 (x)：蒙古文学语言、中期蒙古语 qilyasun- > kilyasun，莫戈勒语 qilyasun，卡尔梅克语 kilyasn，鄂尔多斯语 kilgasu，阿拉尔布里亚特语 silghaq，喀尔喀语 x'algos。蒙古文学语言 noqaj “狗”，莫戈勒语 noqci，德尔伯特卡尔梅克语 noxã。

(23) 复数 -n (175ff., 183)。复数 -n 在使用上总是非常有限的。它出现在蒙古文学语言里，还出现在中期蒙古语一些较小范围内，但是在现代语言里它主要被限于喀尔喀语和鄂尔多斯语。

(24) i 的“转折” (36ff.)。在某种条件下，各种蒙古语里的 i 有的变为后元音。由于受布里亚特语和达斡尔语的一些影响，这种现象一般被限于土族语、卡尔梅克语、喀尔喀语、鄂尔多斯语：蒙古文学语言 miqan “肉”；布里亚特语 m'axaq，达斡尔语 m'ayã；卡尔梅克语 maxn，喀尔喀语 maxxö，土族语、鄂尔多斯语 maxa。蒙古文学语言 nilbusun “眼泪”；聪戈尔布里亚特语 n'olmos，达斡尔语 n'ombos，卡尔梅克语 nülmsn~nul'm'sn；喀尔喀语 nulmos，土族语 numpudze，鄂尔多斯语 nulmusu。蒙古文学语言 nidün “眼睛”，达斡尔语 n'idë；布里亚特语 n'üdeq，卡尔梅克语 nüdn；喀尔喀语 nüddü；莫戈勒语 nudwn，鄂尔多斯语 nudw；土族语 nudu。

4. 一方面通过对这些语言之间所获得的大量差异的检验，另一方面通过对由达斡尔语、莫戈勒语和西南方言（包括土族语）代表的这个语群的检验，能够进一步正确地观察到东部语言和西部语言之间的密切关系。我们可以把这种密切关系在地理上作为中部和边缘语群之间差异的特征。

我们已在 (# 1—3) 和 (# 13—21) 里见到了中部语群所特有的，而不是与边缘语群语言所共有的特征。总的说来边缘语群所具有的特征中部语群也具备。这种设想说明东—西二分法同中部语群和其他语言的对立相比显得不那么重要，边缘语群本身则不存在这种情况。

可是，如果我们对边缘语群的一些语言进行检验的话，我们就能观察到许多共有的成对的重要特征和次要的差异。只是在达斡尔语和土族语中保持了原始阿尔泰语 \*p 的表现形式 (# 25)。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因为具有这类表现形式的方言同无这类表现形式的方言之间的分化必定在很久以前。这些语言还单独有一个浊塞音 \*q (# 22)。在达斡尔语和土族语里而且在许多相同词里很容易发生 n > l 的变化 (# 26)。

(25) \*p- (96ff.)。原始阿尔泰语有词首音 \*p。在中期蒙古语里 \*p 演变为 h。但是，在蒙古文学语言和大多数蒙古语里 \*p 已丢失。只是在 Ts 达斡尔语和西南诸方言如保安、东乡、三川和锡拉裕固语里，\*p 作为 h 或 x 被保留着。在土族语里，除了在一定上下文里为 f 外，一般情况下以 x 被保留着：满 (Ma) 语 funsun “气味”，戈尔德语 (Goldi) pun；中期蒙古语 hünir “气味”，蒙古文学语言 ünür，土族语 funir，三川语 xunir (托达明娃 1973 : 371)。满语 fon “时间”，科尔诺 (Kor) pom “跳”，中期蒙古语 hon “年”，蒙古文

学语言 on, 土族语 fān, Ts 达斡尔语 xyan, 三川语 hyan。

(26) \*n > l (163)。\*n > l 的变化通常是异化的结果。但是, 在其他条件下可能是一种偶发的变化。这种变化出现在达斡尔语、土族语里, 偶尔也出现在其他语言里: 蒙古文学语言 nabči ~ namči “叶”, 达斡尔语 lartʰʰi, 土族语 labʰdʰʰi, 阿鲁卡尔津语 laptʰi, 喀尔喀语 nabʰʰi, 鄂尔多斯语 naptʰi。

前圆唇元音在达斡尔语和莫戈勒语里已合并( #4)。仅仅这两个语言保持 \*ai 复元音的表现形式( #6—原文有误应为 #5—译者)。他们是古 \*ayū 的复合元音。

唯独土族语和莫戈勒语专门把 \*ese 作为过去时的否定词( #12b)。仅仅他们丢失了元音腭位和谐( #27)。

(27) 元音腭位(舌位)和谐(84ff.)。在蒙古文学语言和中期蒙古语里发现的元音腭位和谐系统很好地被保留在布里亚特语、卡尔梅克语、喀尔喀语、鄂尔多斯语, 还有达斡尔语里。在土族语和莫戈勒语里元音腭位和谐系统基本上是非能产的。它残存于一些西南方言(托达叶娃, 1966) 而不存在其他语言里(托达叶娃, 1961)。

在有关的土族方言里有许多特殊的发展, 这些发展可能反映了同边缘语群的其他语言的差别。例如, 土族语的前圆唇化元音已后退到与它们相对应的后圆唇元音的位置上: 见( #1, 2)。

土族语的其他特殊发展包括: ①在一定的同化条件下, 土族语的 i 变成 u (35f.): 土族语 bu “我”, 蒙古文学语言 bi; ②在一定条件下 b 变成 u (99): 土族语 wī “是”, 喀尔喀语 bi; ③ t 和 k 腭化为 č: 土族语 tʰʰida- “拉”, 达斡尔语 tata-; ④仅仅土族语有一个 \*ča 高格(200); ⑤仅仅土族语有一个 -sgi 复数(波普 1955: 178); ⑥只有土族语有 -re 方向格(斯米特和莫斯塔尔特 1964: 24ff.)。

这些事实充分说明边缘语群诸语言已经变成了孤立语。也许在不同时期, 它们是来自中部语群的语言。但是, 它们一定是在后来语言共有的重要变异之前。不仅仅通过地理和历史事实说明不存在边缘语群统一时期(这一点与我们无直接关系), 而且更重要的是通过缺乏共同的变异, 从总体上看不仅仅是跨语群, 甚至可以说语群内部的成对的共有变异来说明这一情况。如果我们对布里亚特语和喀尔喀语, 或者它们同内蒙古诸方言, 或者所有语言与卡尔梅克语和卫拉特语共有的特征进行检验, 那末我们就会注意到它们是在蒙古文学语言(和中期蒙古语)里未表现出来的或正在发展的主要变异: 唇位和谐( #1), k 和 q 的擦音化( #2, #24), \*č 和 j 的腭化消失( #14), 后元音前化( #15), \*ügei 作为所有动名词的否定词的用法, 复数 -d 的新复合形式( #18)。在蒙古文学语言中发现的其他格特征仅仅在这个语群中被发现, 而且很可能代表古老的变异(或者在某些格里保留着): nomen usus( #13), 词首重音( #16), “程度格”( #17), 复合联合格( #19a), 指示词下( #20), 复数 -n( #23), 元音腭位和谐( #27)。

在边缘语群里没有发现这类的变异。作为一个整体这个语群所共有的所有特征或共同保留一个状况的成对特征已经在蒙古文学语言或中期蒙古语里发现了。

5. 正如多费尔(1964: 36ff.)所评述的, 在蒙古语早期发展中没有不同时期的可靠例证。例如在早期文献中出现的这类差异(词首 h-或无词首 h, 参见 #25; 保留 VCV 序列或缩减为 V'V 序列, 或者缩减为长元音, 参见下面 #28; qi 或 ki, #22; e 在 ö 后圆唇化, #1) 并不是一致的(有时在胡同文獻里), 它们不能一致地证实任何(东—西)方言差别(参见古尔斯基 1969 著作), 而且在任何情况下, 现在都不能与任何现今的方言边界有联系。

大家一致认为,所有特征中最“古老”的特征痕迹是土族语的词首f-,它比已在中期蒙古语里发现的h-更古老些。<sup>①</sup>但是土族语在其他重要方面并不那么古老,它没有保留\*qī(#22),它把VCC序列减缩为单元音(#28),而且使e圆唇化为ō(然后向后移,#1)。现在不可能确定它们是否是被继承下来的与其他语言所共有的特征,或者是运用于类似语言的相似作用的偶然结果。

(28a) BryBf 型序列(70ff.)。在大多数语言里的BryBf型序列。Br是一个后圆唇元音,Bf是后展唇元音,它们演化为长的单元音。在其他语言里演化为复元音。蒙古文学语言词首音节oyo是中期蒙古语o'o;仅仅在莫戈勒语里作为一个复元音被保留下来(ua)。蒙古文学语言后一音节的uya在《蒙古秘史》里出现为o'a,而且在其他语言里已被单元音化;蒙古文学语言doluγan“七”(246),《蒙古秘史》doio'an,卡尔梅克语dolōn,土族语dolen。莫戈勒语boron“雨”(韦尔斯1972:161),蒙古文学语言boruyan。莫戈勒语qana“他…弄干”,中期蒙古语(Muqaddimat al Adab)qu'asun“干”。

(b) BfγBr 型序列(67ff.)。BfγBr型序列在大多数语言里演化为圆唇化单元音。只是达斡尔语、莫戈勒语和卫拉特语(不是卡尔梅克语)在一定条件下是复合元音:蒙古文学语言sibaγun“鸟”,中期蒙古语(Muqaddimat al-Adab)siba'un,卫拉特语siboun;布里亚特语subun,达斡尔语sowō,卡尔梅克语sowān,喀尔喀语suwā,鄂尔多斯语siwā。蒙古文学语言qalayun“热”,莫戈勒语qalōun~qalan。

同样,虽然莫戈勒语处于早期孤立的地理位置,但是,根据它保存\*qī的情况来看,它不可能被认为是最“古老”的语言,因为\*qī始终不会比土族语或达斡尔语\*qī的表现形式更古老。没有理由怀疑现存的方言差异比由于中部语群的变异而产生的分化更早些,但是至今没有有关这方面的明显例证。

通过唇位和谐的不同处理(#1)清舌根塞音(#2,22)和也许稍有差别的否定结构表明了卫拉特语不总是属于布里亚特语-喀尔喀语等的变异语群。必定有这么一个时期,在这个时期里,从语言学上看,卫拉特语脱离了“中部”(或偏东)方言。只是后来这些变异才扩展跨过了它们之间的界限。

因此,单纯的谱系不能公正评判蒙古语史。现在卫拉特语特征有两个来源,早期的是“西部来源”(?) (例如缺乏唇位和谐)和较近期的是“中部”来源(诸如后元音前化,#15)。根据游牧社会的性质,为居住在具有明显界限社区内的定居居民设计的明显无联系的系谱二分法模式,同某种网状模式相比,可能被证明没有充分了解蒙古语的历史,这一点没有什么可惊奇的。通过对后者的研究而不是对前者的研究,发生学关系的模式类型可能最终证明是更富有效应的。

#### 注解:

①加拿大社会科学和人类学研究委员会为此文初稿研究提供了资助。我大量利用了波普教授的许多著作,同时相信波普教授和其他学者提供的蒙古诸语亲缘关系的权威性描述可能有问题。波普教授对初稿作了详细的评论,但是我没有全部采用他的建议,他很可能不同意本文所谈到的每个方面,他的意见和提供的资料是十分宝贵的。我还十分感谢哈马(Lucia Hammar)和施莱普(Wayne Schlepp)的协助。

②参见《中国的少数民族》(1977)第11页;梅列特(Meillet)和科恩(Cohen)(1952),地图6张;《中国人民》(1980);《苏联人民》(1976),波普(1970),封面图第1页;



托达叶娃(1960), 地图。

③例如,《不列颠大百科全书》(第15版), *Micropaedia*, 6, 994 (芝加哥, 1975)把语族分成西部或“卫拉特语群”(卡尔梅克语、卫拉特语和莫戈勒语)和东部语群(蒙古语、布里亚特语、达斡尔语、土族语、东乡语)。《新哥伦比亚大百科全书》, 1812 (纽约, 1975)同样地把语族分成西部语群和东部语群, 但是没有列举出每个语群的所有成员。

④参见桑席耶夫(1952: 35, 40)有关达斡尔语、土族语和莫戈勒语地位的探讨。

⑤波普(1955)和多尔弗(1964)提出一组标准特征, 他们同依靠语言学上不相连的一个或两个等语线的那些学者不一样。但是, 甚至波普(1965: 7f.)还提出五个特征作为他的分类基础。他提供的土族语和东乡语之间唯一差异是, 例如, 东乡语的结尾-t如果丢失的话。相对来说在标准文学语中很少有经过筛选和作过评价的等语线特征的探讨。

苏联学者强调元音和谐的存在与否, 而把区别半能产的和不能产的元音和谐有关的困难搁在一边, 但是在哪里存在着为什么这个特征会如此特殊问题, 一种主要的二分法也不会只依据一个等语线; 我们只需要在这里引用布龙菲尔德(Bloomfield 1933: 342)的一段话就会明白: “在许多同一方向上紧密聚集在一起的一束等语线——叫做等语线束——比起单一等语线来, 它提供了更加恰当的分类基础, 单一等语线也许表示某些不重要的特征”。

⑥尽管波普(1955: 15)的“语言的分类应该是一种语言学的分类”的提法确实是正确的, 但是就其本身来说, 这种提法提出了什么是语言学的分类的问题, 而且以哪种例证为基础。在波普给与方言相对立的语言下定义的讨论中指出(19)“虽然卡尔梅克语(在苏联以外)同卫特拉克语很接近, 但卡尔梅克语仍是与之不同的语言, 因为它一直受到俄语和塔塔尔语(鞑靼语)(Tatar)的某种影响。在语音上或形态上同卫拉特语稍有差别, 但是它们的词汇是非常不同的”。把如何确定词汇差别的问题除外, 那末这类差别是还是不是纯语言学现象呢?

⑦多尔弗(1964: 40)观察到对于今天的喀尔喀人来讲, 卫拉特语比西部布里亚特语更好理解, 这完全是因为布里亚特方言s-特征有轻微变化。然而, 桑席耶夫(1952: 40)暗示操喀尔喀语、卫拉特语和布里亚特语的人在交谈过程中能做到相互了解。另一方面, 鲁彭(R. Rupen)在《美国大百科全书》第19卷, 357页(1979)中写道: “发音、词汇、和语法的差别使布里亚特语同喀尔喀语几乎互相不能通话”。来自博松(James Bosson)同一位操察哈尔语的人——Yidamjab Meng的私人通信暗示桑席耶夫的意见是正确的, 在这种情况下多尔弗看法的说服力削弱了一些。当然, 共时层的类似程度本身并没有对历史关系的程度有所指导。

⑧在每篇表数码的文章的开头都给波普(1955)提供一页参考书目, 为了便于印刷对波普的标音作改动: ①khi一律用x代替; ②布里亚特语和喀尔喀语里的前化后圆唇元音总是用ö和ü来标记, 不管它们的语音情况如何; ③喀尔喀语等的非重音i元音以'来表示; ④所有腭化辅音用附加符号'表示; 因此腭化s是s'。本文引用的全部形式, 除特别指明以外, 都来自波普1955年的材料。

⑨多尔弗(1964: 35)争辩到上族语f-可能是受后面圆唇化元音同化的结果而变成h-。拿土族语fan“年”来说, 根据这个词的元音不久前变成a来看, 多尔弗的看法同f变成h限于后面非圆唇化元音上下语境中的看法相比似乎没有这种可能性。